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

目标·路径

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

郑有贵 著

MUBIAOYULUJING
ZHONGGUOGONGCHANDANG
『SANNONG』LILUNYUSHIJIANG6ONIAN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

目标·路径

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

郑有贵 著

WUBIAOYULUJING
ZHONGGUOGONGCHANDANG
『SANNONG』LILUNYUSHIJIANGONIAN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 60 年 / 郑有贵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5438 - 5984 - 5

I. 目… II. 郑… III. ①农业经济 - 研究 - 中国②农村经济 - 研究 - 中国③农民 - 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F32 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0331 号

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 60 年

郑有贵 著

出 版 人：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李建国 黎晓慧 李雄伟 章红立

装 帧 设 计：陈 新 + 杨发凯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2 1 / 16

印 张：32.25

字 数：515000

书 号：ISBN 978 - 7 - 5438 - 5984 - 5

定 价：64.00 元

营销电话：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走中國特色農業
現代化道路

姜春雲

二〇〇九年九月三日

绪 论 / 001

- 一、“三农”及其问题所在 / 002
- 二、工农、城乡结构转换的理论模式 / 005
- 三、“三农”政策演变影响因素与研究主线 / 010
- 四、“三农”政策的四次重大选择 / 012
- 五、问题的讨论与结论 / 016

历程研究篇 •

第1章 农业社会的“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 / 027

第一节 “三农”问题的历史性与政策目标的选择 / 028

- 一、“三农”问题的历史性 / 028
- 二、新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起点 / 029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农”政策目标的选择 / 031

第二节 以土地改革为路径解决“三农”问题 / 032

- 一、土地改革的抉择 / 032
- 二、土地改革的政策选择 / 038
- 三、土地改革的绩效 / 047
- 四、土地改革对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影响 / 051

第2章 国家工业化战略下“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 / 053

第一节 国家工业化与“三农”政策目标 / 054

一、国家工业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双重使命 / 054

二、国家工业化战略下“三农”政策目标的选择 / 056

三、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取向的确立 / 059

第二节 以计划经济为内核的路径探索 / 062

一、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产品统派购的路径改造小农经济 / 063

二、以人民公社的路径解决“三农”问题 / 073

三、以二元户籍管理和就业制度强化二元结构 / 082

四、倡导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以应对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 / 085

第三节 政府与农民互动下的政策微调 / 094

一、集体经济、计划经济下的私有经济和集市贸易 / 094

二、农民的探索——包产到户三起三落 / 104

三、城乡二元产业政策与农村五小工业的反反复复 / 110

四、对农民抵触开展意识形态的教育 / 115

第四节 城乡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 / 119

一、工农业发展失衡 / 119

二、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 / 120

三、农业的两次大波折 / 121

四、“三农”困境 / 125

第3章 向工业化中期迈进时期“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 / 127

第一节 建设现代农业与“三农”政策目标调整 / 128

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部署 / 128

二、“三农”政策目标的调整 / 129

三、农业养育工业政策的重大调整 / 132

第二节 以赋权与放活为内核的路径探索 / 139

一、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重塑农民家庭经济 / 139

二、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重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 / 154

三、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 / 158

四、探索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农民就业和人口的非农化	/ 163
五、实行政社分设和村民自治，推进民主建设	/ 169
六、实施扶贫开发，解决贫困地区的“三农”问题	/ 177
第三节 结构转换与二元结构的初步破解	/ 179
一、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换	/ 180
二、农业素质的提升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根本改变	/ 182
三、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结构的改善	/ 183

第4章 进入工业化中期“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 / 185

第一节 统筹城乡发展与“三农”政策目标调整	/ 186
一、统筹城乡发展和重中之重指导思想的确立	/ 186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任务的提出	/ 188
三、“三农”政策目标的调整	/ 193
四、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取向的确立	/ 194
第二节 以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变为内核的路径探索	/ 200
一、取消农业税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 201
二、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加大对“三农”的支持	/ 207
三、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 216
四、壮大以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内核的县域经济	/ 219
第三节 “三农”发展进程评析	/ 228
一、农民的大解放与发展政策的转变	/ 229
二、传统农业快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 237
三、农业功能拓展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 249
四、全局观下的“三农”问题	/ 252

综合研究篇 ●

第5章 “三农”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 259

第一节 “三农”的基础地位论	/ 260
一、农业基础论的丰富和发展	/ 260
二、农村和农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 264

三、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优先位置 / 266
第二节 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论 / 269
一、农业现代化、农村发展工业和小城市的构想 / 269
二、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之路 / 274
三、逐步解决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 / 277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 279
第三节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与农业组织化论 / 280
一、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与经营制度的认识 / 281
二、对合作社经济的认识 / 286
三、组织起来与农业“两个飞跃” / 299
第6章 “三农”重大决策 / 306
第一节 建制与发展的决策 / 313
一、土地改革法的决策 / 313
二、全面推进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策 / 314
三、农业发展纲要的决策 / 318
四、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调整的决策 / 321
第二节 改革与发展的决策 / 335
一、启动农村改革的决策 / 335
二、赋权与放活的决策 / 340
三、工业反哺农业与城乡一体化的决策 / 356
第7章 “三农”基本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 / 376
第一节 “三农”基本政策的演变 / 376
一、所有制变迁 / 379
二、经营制度变迁 / 381
三、分配制度变迁 / 382
四、工农发展关系演变 / 383
第二节 “三农”政策演变的动因 / 387
一、改革前后影响“三农”政策制定因素的比较 / 387
二、“三农”政策制定中的经济动因与意识形态动因 / 389

三、“三农”政策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及整个经济社会政策中的定位	/ 390
四、工农发展关系演变反映出的一般规律	/ 392
第三节 基于 60 年经验的“三农”政策模型	/ 397
一、基本经验和原则	/ 397
二、变量及趋势	/ 403
 第 8 章 现代农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的前瞻 / 406	
第一节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 407
一、现代农业的内涵及特征	/ 408
二、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 411
三、推进劳动过程的机械化	/ 418
四、培育和壮大现代产业组织	/ 428
五、促进政策组装实施与产业体系协调运行	/ 444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449
一、从比较视角探讨新农村建设	/ 449
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458
第三节 促进城乡一体化	/ 461
一、促进农民就业非农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同推进	/ 461
二、促进资金留乡和资本下乡	/ 468
三、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 474
四、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	/ 483
五、构建起以法律为保障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体系	/ 486
 主要参考文献 / 493	
后记	/ 501

XULUN
绪论

本绪论展开了前导性研究，主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60年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三农”问题；二是，发展经济学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三是，60年间，影响中国“三农”政策演变的主导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又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基于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展开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四是，60年间，中国“三农”政策经历了几次重大选择，每次重大选择的政策转折或突破是什么。最后，概要介绍各章讨论的重要问题及形成的结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新中国60年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框架和逻辑是，再现新中国60年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进程，但又不局限于事实的罗列，而是以中国共产党对“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的选择为研究主线（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以“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的选

择为主线的基本事实），并以历史观和国际视野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力求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解“三农”政策之演变、析“三农”理论之创新、探“三农”发展之路径、究“三农”决策之动因，在此基础上揭“三农”趋势之指向、献“三农”对策之管见，并从中得到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结论。

一、“三农”及其问题所在

新中国 60 年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只有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才有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的选择，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再现历史进程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概括而言，新中国 60 年的“三农”问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性结构演变进程中的问题，它既有一般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普遍问题——传统的农业部门与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又有特殊问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城乡二元政策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给“三农”的发展提供了机械、电力、化肥、科技、信息等全新的生产要素，同时又以农业剩余及土地、劳力等生产要素向其转移为基础，加之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乡二元制度的实施及 21 世纪初以城乡一体化为取向的改革，使得 60 年间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极其艰难而又复杂。这就是 60 年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背景，也是中国“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的历史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农业、农村、农民的内涵与边界是明确的。然而，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路径的特殊性，如探索出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之路，再如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仍保持农业户口不变而被称之为“农民工”，这使得对现阶段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内涵和边界的描述变得复杂。不仅如此，在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换言之，中国的“三农”及其问题，有其特性，对其进行简要讨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本书研究方向和重点的更好把握。

农业是培育植物、动物以取得各类农产品而又具有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的物质生产部门。按照技术状况划分，农业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技术和手

段上，主要表现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尚未完成；在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上，20世纪末之前主要表现为农产品数量供给不足，而21世纪开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品种和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相适应；在国际贸易上，主要表现为农业竞争力不强；在发展能力上，主要表现为发展后劲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其中，农业发展能力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表现。农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解决农业发展能力这一根本性问题着手。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其他社会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农业小部门化趋势明显，但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日益拓展，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不是弱化而是更加彰显，农业基础地位的牢固与否事关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而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成为共识。换言之，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范畴的问题，同时也是事关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

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口聚居的地域。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开始开辟耕地，进行田间耕作，人口也开始聚居到一定的固定地域内，于是形成农村。伴随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农村经济也进一步发展起来。^① 农村问题既包括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也包括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问题，即是集经济社会政治于一体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实施了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阶段中国的农村问题，是实施工业化战略及其配套的城乡二元制度所导致的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和生态环境较差等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共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新要求。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的实施，城乡二元结构将被逐步破除，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农民本应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主要依靠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劳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现代经济辞典》，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3页。

者。但是，在当代中国实行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农民的范畴较宽，即凡户籍登记为农业人口者，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其抚养的人口，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还是从事非农产业，均被视为农民。正因为如此，农村居民到城里务工被称为“农民工”。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了农民。在各种社会形态下，农民都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的经济性质有所不同。奴隶社会的农民可分为自耕农和隶农，自耕农是拥有少量土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由农民；隶农是依靠租用土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佃耕者，是介于自耕农和奴隶之间的生产者。中国封建社会有自耕农、佃农、雇农和地主。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以“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土地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阶段在农村居民中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已大量减少，既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有兼业农民，还有大量从事非农产业的居者。“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人的发展和权益问题。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需要形成以农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为取向的政策体系。

60年间，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没有实现发展，更不是农业的衰弱、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落，相反，“三农”实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那么，为什么现阶段中国还存在“三农”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忧虑和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客观存在，这毋庸讳言，它实质是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的结构问题，即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发展失衡，这种结构失衡，不仅约束着“三农”的进一步发展，还导致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不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不适应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有可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换言之，“三农”问题是整个经济社会如何进一步实现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及难以解决的原因，除历史遗留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选择了工业和城市偏向政策，以及保障这种偏斜政策能够得以实施的城乡二元制度，使有限的资源向工业部门过度集中配置、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条件与水平的不平等、经济社会的发展机会与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进而陷入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困境。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中国共产党正视“三农”问题，迎难而上，倾注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之发展路径，创造了当代中国“三农”的辉煌。

二、工农、城乡结构转换的理论模式

如上所述，60年间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性结构演变进程中的问题。鉴此，本书在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理论的同时，应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对新中国成立60年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为此，下面对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结构转换的理论模式做一简要述评。

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面临如何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重大课题，提出了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多种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必须实施二元结构转换，将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结构；二元结构转换的核心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二元经济部门的转化过程实际上是城乡结构转变的城市化过程。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于1954年、1955年先后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等著作，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假定发展中国家经济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所构成。他认为，由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存在着向城市流动的自然倾向，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不断获得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剩余劳动力由边际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的转移，可以促成工业利润和资本的增长，从而推动工业部门的扩大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只要农业部门存在着过剩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就会持续下去，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流向工业部门为止。这种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共性，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完全吸纳之后，二元经济就转换成了一

元经济，传统农业部门也就完成了其发展使命。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部门集中在城市，传统部门分布在农村，因此在刘易斯那里，二元经济部门的转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城乡结构转换的城市化过程。刘易斯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结构转换时期出现的“涌向城市的人口浪潮”。他指出：“为挣工资而在城市就业的人口的供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增长起来了。第一，城市工资与乡村收入的差距大大地扩大了；第二，在不少国家，乡村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青年人的进城势头更加迅猛；第三，发展和福利开支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使得城市更具有吸引力。”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过度集中于城市的问题，他对农村小城镇在城市化中的作用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并提出：“相当经济的办法应该是发展大批的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一些能够吸引农民的设施。”

经拉尼斯和费景汉修正后的二元结构模型，强调在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要对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农业劳动力移动要以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为先行条件。刘易斯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由于工业资本不多，无力吸收全部剩余劳动，因此无论对劳动力需求怎样扩大，总能在不变的低工资水平上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供给。这样工业总产值中利润部分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工资部分增长的速度，于是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一个资本加速积累和迅速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增长时期。直到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中，二元结构也就变成了一元结构，也就完成了不发达经济的发展问题。但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产生了农业贫困问题，农民收入水平持续下降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主张工农平衡发展。刘易斯也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对过去重工轻农的观点作了明显修正，主张工业和农业应平衡发展。针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对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未予以足够重视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先行条件的忽视的缺陷，拉尼斯（G·Ranis）、费景汉（J·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修正。他们把二元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刘易斯模型基本相同。在这一阶段，经济中存在着隐蔽失业，即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因而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农民的收入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等于制度工资。当这部分多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撤出转入工业部门

时，农业总产不受任何影响，因此这时就会产生农业剩余，它等于农业总产出与农民消费之差，正好满足转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对粮食的需求。这个阶段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没有变，工业部门的工资也保持不变，当这部分多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在第二阶段，工业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量（它等于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当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之后，农业总产出就会下降，而剩下的农民的消费仍和从前一样多，所以这时，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产品就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来供养工业部门的劳动者。换言之，人均农业剩余降到制度工资以下。因此，开始出现农产品短缺，并由此引起粮价和工业部门的工资上涨。在这一阶段，劳动力转移越多，粮价越高。当农业中全部剩余劳动力都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就业之后，经济发展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农业开始资本化，农业和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由其边际生产率决定。他们认为，农业促进工业增长的作用，不仅是消极地输送劳动力，而且还积极地为工业部门的扩大提供必不可少的农产品（首先是粮食）。基于此，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

乔根森进一步完善的新二元经济模型，强调农业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创立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模型。乔根森否认农业有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存在，也不认为农业与工业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与刘易斯等人一样，乔根森也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他假定，农业中没有资本积累，工农业生产都随时间而自动增加。这种不增加要素而增加产出的现象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乔根森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在这个假定下，乔根森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供给。当粮食供给充裕时，人口增长率将达到生理最大值。如果人均粮食供给超过最大人口增长率，就产生了农业剩余。农业剩余使得总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口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生产工业品，这样，农业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其转移规模必须与农业剩余的规模相适应。就工业部门来说，只要工业部门存在一定量初始资本，那么这种由于农业剩余而造成的劳动力转移就会给工业带来增长；只要农业剩余是递增的，那么工业部门的增长也持续下去。农业剩余越大，劳动力转移

规模也就越大，工业部门就越有可能更快地发展。因此，乔根森认为农业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工业扩张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率的上升，所以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不断上升的。为了引诱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工业工资又必须高于农业工资，二者的差异保持一定比率。因此，随着工业工资上升，农业工资也必然不断上升。与刘易斯模型相比，乔根森以农业剩余为基础，把农业剩余看做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这就更加强调了农业进步和农业发展对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在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农业剩余也是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关键因素，但拉尼斯和费景汉所说的农业剩余是与剩余劳动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乔根森的以最大人口增长率为前提的农业剩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乔根森否定了固定工资假定，更看重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也比刘易斯或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更接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但是，乔根森模型也有与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同样明显的缺陷，如它们都忽视了对农业的物质投资和城市失业问题等。

结构转换理论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同性、一致性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1975年，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尔昆出版的《发展的模式：1950—1970》，通过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数据资料的分析（见表1），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分析表明，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增加，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人口也从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出一种畸形偏差，将对城乡协调发展和长期增长带来不利影响。